

朱瑞熙教授八秩寿庆文集

戴建国 陈国灿 编



中国石油大学

# 朱瑞熙教授八秩寿庆文集

戴建国 陈国灿 编



中国商务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瑞熙教授八秩寿庆文集 / 戴建国, 陈国灿编. —北京: 中国商务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5103-2074-3

I. ①朱… II. ①戴… ②陈… III. ①朱瑞熙—生平事迹②中国历史—古代史—文集 IV. ①K8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47211 号

## 朱瑞熙教授八秩寿庆文集

戴建国 陈国灿 编

出版: 中国商务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东后巷 28 号 邮 编: 100710

责任部门: 商务与法律事业部(010-64245686 cctpress1980@163.com)

责任编辑: 胡志华

总发行: 中国商务出版社发行部(010-64266193 64515150)

网购零售: 中国商务出版社淘宝店(010-64286917)

网 址: <http://www.cctpress.com>

网 店: <http://www.taobao.com>

邮 箱: [cctp@cctpress.com](mailto:cctp@cctpress.com)

排 版: 浙江大春传媒有限公司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980 毫米 1/16

印 张: 23.5

字 数: 40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3-2074-3

定 价: 188.00 元

凡所购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商务与法律事业部联系。(电话: 010-64245686)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盗版侵权举报可发邮件到本社邮箱: [cctp@cctpress.com](mailto:cctp@cctpress.com))



朱瑞熙教授近影



朱瑞熙教授夫妇



1961 年在上海



1961 年在上海与复旦大学古代史专业同学合影



1964 年在四川成都与四川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同学合影

1986 年在江苏南京



1995 年在浙江杭州  
接受电视台采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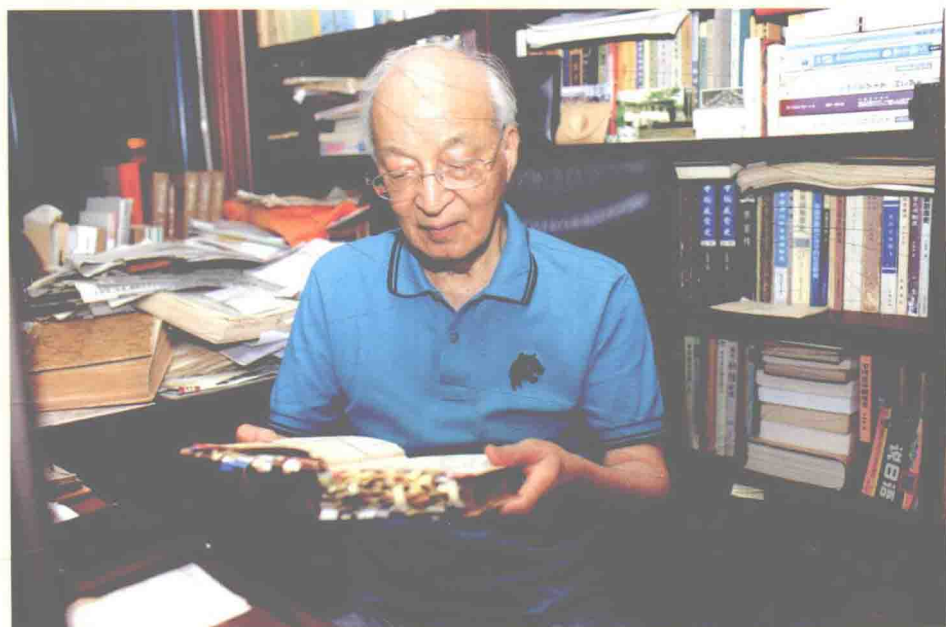


2003 年在上海





2007 年在日本



2017 年在上海



1964 年在四  
川大学与徐中舒、蒙  
文通先生及部分同  
学合影



1965 年在北京与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部分同事合影



1984 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与邓广铭、陈乐素、郦家驹、漆侠等教授合影



1985 年在上海与佐竹靖彦、张希清、俞宗宪教授合影

1989 年在河南大学与王云海  
教授合影



1996 年在台北与陈立夫先生  
合影



1980 年在台北与王曾瑜教授等合影

1990 年在上海与王德毅、裴汝诚教授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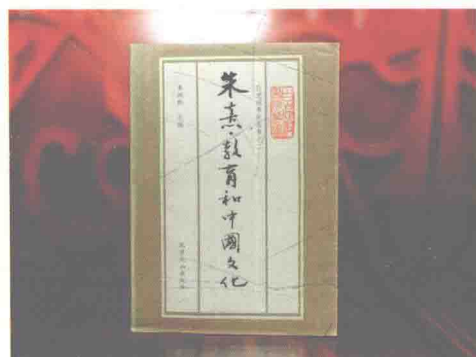
2000 年在苏州与杨国宜、张希清教授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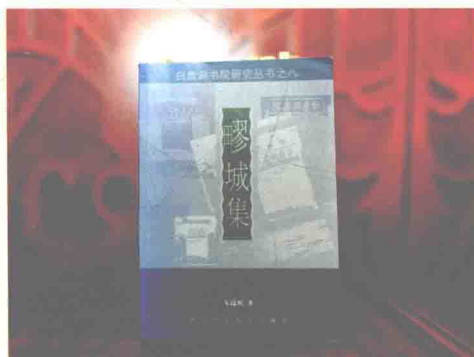
《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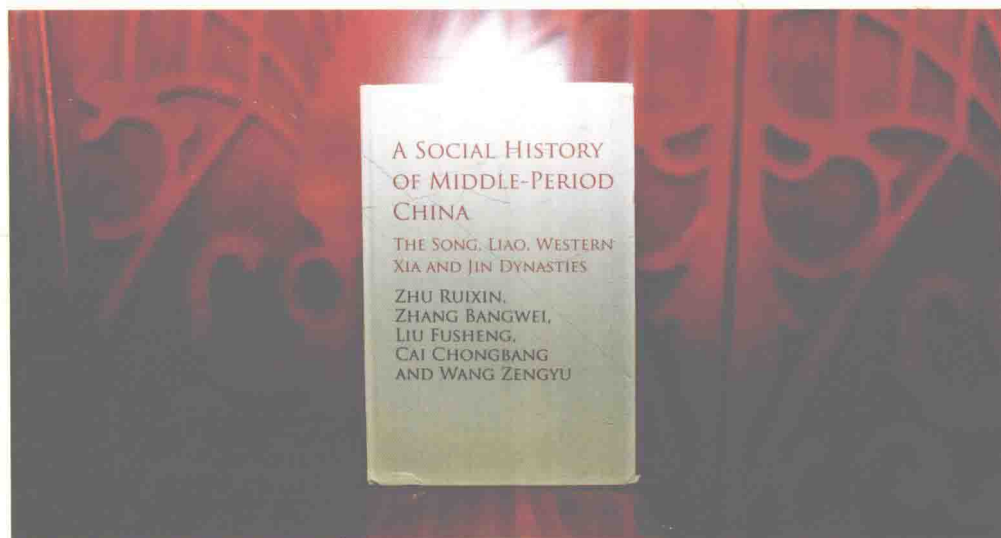
《传世藏书·别集》



《朱熹·教育和中国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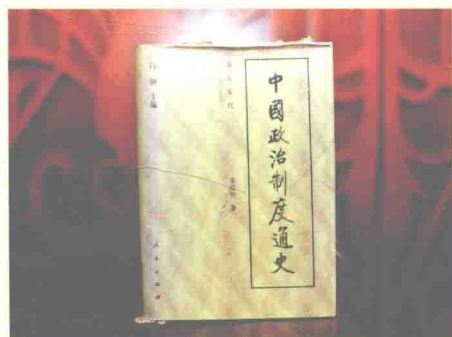
《罗城集》



《宋辽夏金社会生活史》(英文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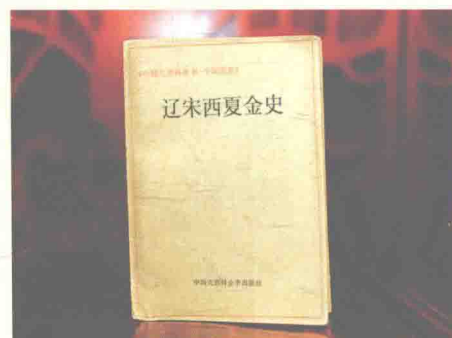
《宋代社会研究》(中文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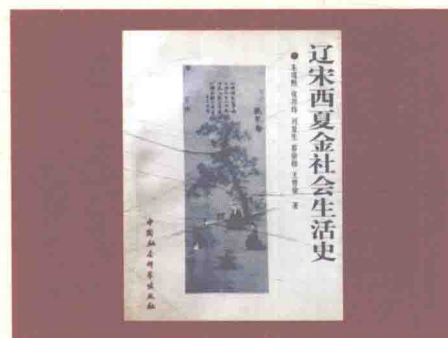
《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



《中国通史》(宋代卷)



《中国大百科全书》(辽宋西夏金史)



《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

## 序 言

人生七十古来稀。但在新的世纪里,人们生逢盛世,随着生活水平的日渐提高,身体素质不断增强,“七十岁是小弟弟,八十岁则多来兮”。这是几年前我在上海师大西部操场锻炼身体时,许多老教师的共同体会。为此,大家成立了上海师范大学中老年长跑队和老年器械健身体操队,选举出队长,制定章程等。其中,我也是一名积极参与者。由于坚持锻炼身体,至今自感快到大耄之年,精神和体质尚可,每天仍能操作电脑几个小时。

回忆过去,不胜感慨。从在江苏嘉定(现上海嘉定区)练西小学读书起,自己连读嘉定县中学、复旦大学历史系、四川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整整读书26年,1965年5月才分配至北京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担任范文澜、蔡美彪先生的助手,参加编写中国通史。

应该说,自己读书还是认真、刻苦的。当然在嘉定县立中学读初一时,因为家里交不起学费,情绪一度不高,读书也不用功。幸而遇到了几位优秀的老师,如胡淑兰、金仲达、朱育和、顾康、张乃敏等老师。在他(她)们的谆谆教育下,养成了学习的习惯:上课专心听讲,课间好好休息,晚上回家复习功课并预习明天的新课。在朱育和老师的教育下,有几年专攻绘画,画过素描、水彩、油画,去野外风景写生过,在室内画石膏像等。

1956年,我顺利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在复旦时,由于不会说普通话,平时不是上课听讲、记笔记,就是下课跑图书馆。毕业前一年,因为年纪小(大部分同学是“调干生”,读大学前已工作几年)、出身好(中农)、读书用功,被系里安排到谭其骧先生领导的历史地理研究室,参加新《辞海》条目的编写和中国历史地图的绘制。当然,这些都是在老教师的指导下做的,最后不列入作者的名单。但就此学会了一些史料的收集、整理的知识,终身受用不浅。这时,还通读了《资治通鉴》、《宋史纪

事本末》等书，为以后的宋史研究打下了基础。

对于当时的整风“反右”等运动，只是随大流，没有积极参加大鸣大放；在批斗同学时，因为自己知道的实在太少，还对被批斗者私下颇为同情，故发言不多。如一位宁波籍的茅姓同学，读书前是解放军副排级干部，大鸣大放时我与同房间几位同学多次劝阻他给校党委书记杨西光贴大字报，但他不管路上有冰雪，还摔了一大跤，坚持从第十宿舍走到教学大楼张贴；不久，“反右”斗争开始，他首当其冲，难逃厄运，被打成“极右分子”。在他被批斗得痛哭流涕时，已后悔莫及，我私下安慰他，劝他不要硬顶。后来他被分配到江西波阳一中教书，“文革”初因为接受1957年的教训，坚决反对学生造反，反而成了“保皇派”，被学生整得很惨，最后投鄱阳湖自尽，十分可惜。“文革”结束前夕，我写信与他家里联系，让他弟弟与波阳一中联系，要求给他平反等等，后来不见回音。在毕业前，我写过入党申请报告，党支部书记胡维国回答说：“小朱，你太单纯了。”这句话令我终生难忘。胡维国在“文革”前夕，因为参加市委“罗思鼎”写作班子，“文革”初期，为了死保市委领导，最后受不了复旦造反派的乱整，跳楼自尽，也令人可惜。

1961年7月，我被分配到四川大学历史系。9月初，到川大报到时，系办公室领导建议不如留下当助教。我考虑四川比较“闭塞”，交通不便，且正面临三年困难时期，师生首先要解决的是吃饱肚子的问题，所以决定先考研究生再说。于是办理报考手续。由于事先不知道应该考哪一专业，系里介绍几位教授招收几个专业，我因为早就知道蒙文通先生的大名，而他招收的是宋史专业方面，我过去读过一些宋人笔记、《宋史纪事本末》，有一点基础，所以决定报考蒙先生的宋史专业。但手头没有带什么参考书，只好临时找了几册《中国史稿》的征求意见稿，看了一下。一个星期后，即参加考试。好在英语、马列主义和专业课题目不难，英语就考《毛泽东选集》中《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古代社会”一节。记得在复旦时，强调学习毛泽东著作，上述一节可以背出。马列主义考卷是跟我同一届的复旦哲学系同学出的题目，内容是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几个问题。专业课考题是蒙文通先生出的，题为宋代是否“积贫积弱”及其原因。考场设在历史系办公室二楼的一小间内，考生就我一人，监考老师把试卷给我后就离开了。三门课考题都比较简单，自己每门只用一个来小时就交卷，每次交卷时总找不到监考老师，只好托行政办公室老师代为转交。办公室老师见这么快交卷，起初以为我考不出来。

考试期间，我就住在川大望江楼招待所。考取后，搬到教工宿舍。

在川大读宋史研究生期间，前两年赶上三年困难时期，学校里第一次招收研究生，每月只发给助学金36元。按照高教部的规定和四川的地区差价，应发40元。

直到快毕业了,有几位理科的研究生从成都工学院的同学处,才知道川大学生科擅自扣掉4元,于是研究生们一起去学生科交涉,要求补发。学生科答应下月起照发,但已扣的就算了,算是留作公积金。研究生们觉得没有道理,决定一起去找一位比较关心学生生活的许副校长,许在学生中威信较高。许答应当月就给大家补发。此事暂告一个段落。但1965年5月,历史系在我的毕业鉴定中旧事重提,还上纲上线说我“带头搞大民主”。其实,我只是跟在一些理科研究生之后,并没有“带头”;同时,所谓“搞大民主”,是1957年“反右”斗争时给所谓“右派分子”定的主要罪行。所以,我在毕业鉴定后,写了保留意见,说明自己只是跟在大家后面,并没有带头。这份材料后来肯定保存在我的档案袋里了。后来分配到近代史所工作,我还担心会造成影响,不过直到退休也没人提起。

当时生活比较艰苦,教师食堂只供应凭饭票定量的一种红油素面,连青菜也没有。后来出现了一种“藤藤菜”即空心菜,大家叫它“无缝钢管”。又有一种叫“牛皮菜”,要用开水烫过去掉部分毒素,人才可食用,据说这种菜在农村里农民本来是给猪吃的。这种面条我可以一顿吃六两(十两制),还要喝一碗面汤,才觉得有些饱。有一次,学校安排研究生去龙泉驿种树,这里是石头山,没有泥土,大家两人分为一组,一人掌杆,另一人抡锤,在石头上打洞,辛辛苦苦干了一天,两人才打了一个直径约半尺、深约半尺的洞,最后撒上油麻种子。还有一个洞打了一半,就收工了,没有打完。有一天晚上,领导派我独自一人去照看一片红苕地,我就坐在地里的一只小凳上,手拿电筒,周围万籁俱寂,始终没有见到一个人影,自己心里居然并不害怕。还有几天,安排大家在校园里挖地,种棉花,锄头挖下去,竟然挖出许多空心砖,砖的四周有花纹,搞考古的老师说这些全是汉砖,我抱了一块回宿舍。可惜后来分配到北京工作时,因为没有装砖的箱子,就把砖头留在房间了。

在这种环境下,自己仍能坚持按照蒙文通先生的要求读书,几乎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境地。在此期间,自己养成了每天读书、做资料卡片、写读书日记的习惯。这种习惯使我终生受用。

由于认真读书,一开始历史系把我当作“好学生”的典型在系里宣传,蒙先生也比较喜欢我。有一次,带我和胡昭曦、贾大权师兄去昭觉寺参观。昭觉寺方丈拿出一些寺院珍藏的历代长老的画像和墨宝(已裱成长轴)给大家欣赏,又与蒙先生谈论佛经。吃饭时,也是红油素面。方丈比较客气,特地在面条中多加“海椒”,把我辣得嗓子直打呃,蒙先生说添加些醋就会好些。有一次,我单独去水井街73号蒙先生家,他邀我一起坐三轮车去春熙路吃冷饮,蒙先生让我尽量享用。回学校后,我将此事私下透露给一名也是复旦历史系分配来的郑姓女老师,1964年10月,川

大历史系搞运动时，她揭发我。此事成为当时“资产阶级专家拉拢腐蚀青年”的一个事例。在川大近四年，我没有问津过成都著名的食品“龙抄手”、“赖汤圆”等，直到21世纪初我去川大讲学，蒙先生的哲嗣蒙默先生特地带我去春熙路一家饭店，才陪我享用成都的全套名点。在川大时，我只在星期六或星期日，偶尔去九眼桥下的饭店吃醪糟蛋，即酒酿滚鸡蛋，一角钱一只蛋，二角钱为“双蛋”。

1964年7月，按制度规定，我在川大历史系已经写好了研究生毕业论文，但系里迟迟不安排答辩。10月，学校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当时学校里流行一种极“左”的说法，即教育部门已经完全被资产阶级知识专家占领，学生们接受的是一套“封、资、修”的教育，学生年级越高，中毒越深。我当时屈指一算，已经是大学八年级、九年级的学生了，当然是中毒最深。那么，中谁的“毒”呢？显然是指恩师蒙文通先生了。1961年9月，我考上蒙先生的研究生后，一开始在蒙先生家听他讲课，他顺便说些社会上的事情。对于他的这些话，我一般不记录，有的确实也没听懂（蒙先生只说四川话）。待到“四清”时，与别人相比，我揭发不出什么东西来，于是被认为中了蒙先生的“毒很深”，跟蒙先生不划清界限。毕业论文《论宋代的佃客》原是有一定新意的，自己也花了不少精力，虽然没有经过答辩，但在毕业鉴定时还是被论定为有“修正主义”的观点，差点成绩不及格，不能毕业。幸而蒙先生、系主任徐中舒先生等出面力争，我才勉强过关，算躲过了一劫。

回忆至此，我由衷地感谢恩师蒙先生，因为他招收了宋史专业的研究生，确定了我一辈子的研究方向，加上他指导的研究方法得当，由此奠定了一定的宋史研究的基础，所以使我终生受用不浅。另外，他潜移默化地教育我待人要真诚、眼光要远大，实际上是让我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

1965年5月，川大历史系终于放行，突然召集几名毕业研究生开会，宣布我们分配的工作单位，要我到北京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通史编写组报到。当月，我依依不舍地告别蒙先生，坐火车到北京王府大街东厂胡同一号近代史研究所报到。这时，近代史研究所里大多数同志都不在北京，一批1964年毕业的大学毕业生都去山东黄县劳动锻炼，所里十分冷清。所长范文澜同志在他家里（王府大街金鱼胡同）接见我，告诉我：第一，帮他写通史不拿稿费，要稿费的话，自己去写；第二，帮他整理出宋朝的相关史料，以便继续写通史简编。不过，还没有等我看什么书，进入角色，当年9月即随一些同事去江西丰城县张巷公社老洲大队参加农村“四清”运动，我担任一位老干部的助手，即工作组组长的秘书，并负责老洲二队的“四清”工作。

1966年6月初，农村“四清”尚未结束，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大家从